

语言与社会互融视角下的网络“系统性错别字”研究

王琨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互联网数字时代背景下, 网络语言的发展更具动态性与创造性。文章从社会语言学的“语言与社会互融”视角出发, 聚焦网络语言中的“系统性错别字”现象, 通过数据分析与文献梳理, 对其分类体系进行考察, 并结合模因论与语言经济学理论, 深入探究此类“错误形式”在网络社会中的生成与传播动因, 阐释其何以具备持续的生命力。研究发现, 网络“系统性错别字”主要可分为效率与避险驱动型、情感与风格表达型及身份标识型三类, 体现了当代青年群体在数字语境下为满足深层心理与社会需求而进行的主动语言实践。然而, 面对网络语言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 尤其考虑到青少年群体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 平台、社会等相关方应加强对其创造与使用的引导与监管, 共同营造一个兼具创造性与规范性的健康网络语言环境。

关键词: 网络语言; 错别字; 社会语言学; 模因论; 语言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 A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数字时代下, 网络空间已然成为语言发展演变的主阵地, 集中体现了当代语言发展的动态性与创造性。笔者发现, 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 网络语言都与传统规范语言存在差异, 并且这一差异已逐渐在发展过程中成为网络语言的标志。其中, 网络语言中一类存在错别字的现象引起关注, 并且近期愈发流行。例如, 以“集美”代指“姐妹”, 以“蚌埠住了”表达“绷不住了”, 乃至近期因字形相近而流行的“你不乖”(意为“你不乖”), 此类现象已不再是偶然性失误, 而是一种主动求变, 展现出鲜明的策略性与文化性, 成为构筑网络身份、传递特定情绪的重要符号。

这一蓬勃发展的语言实践, 对现有传统语言规范提出了挑战。主流研究多从“谐音”、“缩略”、“旧词新义”等构词法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分类描摹, 虽具有价值, 却未能充分解释“错别字”这一独特形式的独立性与社会文化意涵。因此, 本研究旨在跳出传统的构词法分类框架, 将“网络系统性错字”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 探讨这部分词语出现的动因与传播机制, 以期有新的发现。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成果丰硕, 但尚存在可深入探索的空间。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变体, 学者们大多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遵循结构主义的路径, 对网络语言

进行形态分类。例如，宋培杰（2012）将其划分为“词形变异”与“词义变异”；黄兵（2012）则细分为语音、缩略、语义等五种变异类型。这类研究精准描摹了网络语言的“构成”，但将其视为一个静态的结果，未能充分揭示其作为社会行为的“过程”与“动因”。换言之，我们知道了“谐音”是网络语言的常见手段，但无法解释为何“集美”这一特定的“错误”谐音能脱颖而出，成为一种身份标识。

部分研究尝试引入跨学科视角以寻求突破。一方面，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解释网络语言的“省力原则”与“经济效用”。另一方面，模因论则被用于分析流行语如病毒般的“传播机制”。不可否认的是，前者所阐述的应用原则确实是网络语言流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也可能存在过度简化语言选择背后的复杂情感与文化动机；后者则更长于描述这些良莠不齐的网络语言如何快速地传播。但是，这些理论都没有对网络语言中的错别字生成及传播机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探索。

在此背景下，田海龙（2022）提出的“语言与社会互融”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元理论支撑。该理论主张，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在于探究以“语言意识形态”为胶粘剂，将语言与社会互融为一体的语言实践。因此，本文选择单独提取网络语言中错别字现象，立足语言与社会互融理论，引入模因论的视角，追踪分析这些错误形式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复制传播；同时借鉴语言经济学，以揭示其背后的群体选择逻辑。基于此，试图为网络错别字现象做一个从生成、传播到功能实现的全面解释。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本研究采用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以社会语言学的新观点为基础，结合模因论分析传播机制，运用语言经济学阐释选择动机，构建“动机-功能”分析模型。

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理论层面，明确将网络错别字从传统的“谐音”“缩略”等分类中剥离，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提出。利用田海龙的“语言与社会融合”理论具象化分析网络语言中的错别字，并有机结合模因论与语言经济学的观点，创造性地观察网络语言错别字的生成与传播动因，探究此类“错误形式”何以及如何具有网络社会生命力。在现实层面上，网络语言一直是青年群体身份认同与表达的工具。所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也将进一步审视网络错别字带来的社会效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的青少年儿童群体。

四、范畴界定与模型初探

（一）范畴界定

网络语言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带有错别字的流行语，它们的构成往往通过谐音或数字或英

文字母等形式来出现。因此，本文所研究的“网络系统性错别字”，特指在网络特定语境下，因输入失误、认知偏差、方言活用或故意模仿错字形式而产生的，并被社会群体广泛使用的非标准式汉字形式。值得一提的是，网络错别字与前人研究中的谐音、缩略等分类属于交叉又区别的关系。例如，从构词手法上来看，绝大多数网络错别字都利用了谐音原理，“蚌埠住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至于缩略语，其本身就是原词的“错误”变体，只是通过提取与简化后又承载了新的社会意义，这方面来说与本研究对象“网络系统性错别字”“交叉点极少。

（二）分类

基于上述界定，依据本文构建的“动机-功能”分析模型，对网络系统性错字进行类型学划分。该分类不再着眼于传统的形式分类，而是从使用者动机与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揭示错别字出现应用的原因，满足网民的交际需求。笔者依据网络语言使用的核心动机与功能，将其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效率与避险驱动型、情感与风格表达型及身份标识型。结合传播热度与语言形式特点，本研究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具体分类如下：

1. 效率与避险驱动型

“效率就是用正确的方式做事，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互联网信息时代下，更加要求人们信息获得和传播的便捷性和有效性，社会不断催生了许多新的行业形态。近五年来，电商直播已然从一种新兴的销售渠道，演变为当代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与社交模式的重要力量。其万亿级别的市场规模、全民参与的普及程度和高效的产出模式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了适应这种长期高效率、快节奏状态下的模式，商户在直播的同时必须巧妙地适应平台规则，抢夺流量，而其中就有一部分“专门用语”是用错别字替代的。我们以“米——钱”为例。部分平台对“钱”“多少钱”等词汇有限流风险。为了避免内容被限制，人们用“米”代替“钱”。这样既保证了效率又主动规避了限流风险，提高商品的曝光率与成交率。而且这种错别字的选择也不是随意的。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尤其是富饶的珠三角地区，在货币经济未高度发达或战乱时期，粮食（尤其是大米）是最稳定、最可靠的一般等价物。人们常常将一个家庭的赋予程度与粮仓的充盈程度相挂钩。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就有“米=财富”的历史文化认知。在广东方言中，“好有米”也表示“好有钱”的意思。另外，从外来语的角度看，“钱”的英文缩写为“money”，首字母为“m”，“米”的拼音首字母也是“m”，这种谐音联想也推动了“米”代替“钱”的说法。

语言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其为人类表达思想服务的必然性。这些在特定时代背景与环境下出现的错别字，并非都是“糟粕”，在特定语境下实际上也可能发挥积极的语言功能与表达作用。

2. 情感与风格表达型

网络的存在为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交流形式从传统的线下面对面口口相传，转变为线上多向多人的互动模式。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表达欲与分享欲，个体特性得以充分释放，由此催生了大量包含特定错别字、兼具风格与情感色彩的网络热词。

首先，“尊嘟假嘟”源自微博一位博主的模仿小猫小狗说话的文案，其本意是“真的假的”，通过谐音演化为“尊嘟假嘟”，这种可爱的表达方式迅速吸引网友注意力并且在传播过程中，为其制作了大量相关表情包与颜文字“0.o”，使其更加生动形象。其塑造的可爱、撒娇的语态主要用于表达惊讶、怀疑或卖萌，从而实现“萌化”的交际风格，适用于交际双方之间的轻松交流。

与之相比，“孝死我了”则呈现出更强烈的反讽意味。关于其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动漫文化起源。最初可能与动漫中某些角色背叛或伤害父母的情节有关，观众用“孝死我了”来调侃这种违背孝道的做法。第二种是错别字谐音使用。原词为“笑死我了”，用“孝”反而带有嘲讽意味，常用于讽刺盲目维护错误行为的人。这里错别字的应用为原来的“好笑”意思上又叠加一层尖锐的反讽，情感色彩转变为负面。

再如“肝脆薯了蒜了”是指网络上流行的一种零食组合吃法，具体是讲猪肝、薯片和蒜片一起混合食用。这种组合的名称主要谐音“干脆死了算了”，一方面表现年轻人在探索美食吃法方面的创新创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年轻人在面对生活压力时的自嘲和幽默。笔者发现，在互联网环境下，网民的发言呈现出一种“避谏”的趋势，即网友们在表达某些极具负面色彩的词语或句子时，会更换原有正确的汉字而使用某一个错别字或生僻字。例如，“不如三了算了”。而“肝脆薯了蒜了”恰好实现这种替换，在改变原有严肃、沉重的情感色彩的同时而又不失原意。

此外，“泰酷辣”也是一例典型。该词源自一位歌手在演唱会上的口误。他误将“太酷了”发音成“太酷啦”，被网友戏称为“泰酷辣”。主要用于表达对某人、某事或某物的赞赏、惊叹或兴奋之情。使用场景广泛，如看到高难度动作、独特穿搭或完成艰巨任务时，都可以用“泰酷辣”来表达赞叹。此外，它也被用于调侃或自嘲，增加交流的趣味性。相比较于原词，粉丝或网民群体主动选择“泰酷辣”，核心动机就是为了追求更强的情绪表达与风格标记，并在其传播过程中逐渐通过“辣”字达成情绪强化，成为知晓某一特定事件的“暗号”。

以上例证均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当代互联网用户，尤其是年轻群体强烈的表达欲望与活跃地创造性思维。网络语境下，当语言表达的“效率”和“准确性”已被基本满足时，使用的

动机便会向“情感表达最大化”和“社交价值最优化”迁移。这些系统性错字往往就是通过替换一个或几个汉字这样微小的动作实现情感与社交的价值回报，从普通的传递信息到信息、情感、身份与关系的总和。

3. 身份标识型

网络语言的发展具有动态性，网络热梗的出现也因此具有不确定性。然而，每一个个热梗的流行，往往始于部分人群的接触和使用。这种信息获取的先后差异，使该群体内部形成一种基于共同认知的圈层认同，而使用相应的网络语言，也随之成为该圈层成员的一种身份标识。

首先，以“集美”为例。该词原指福建省厦门市的集美区，而在互联网语境中，其被赋予了全新的涵义。这一语义演变始于某网红主播以其特色发音将“姐妹”转化为“集美”，并赋予其“汇集美好、美丽与财富”的积极寓意，用以指称可爱善良的女性群体。随着网络流量的推动，该词迅速扩散，成为一种典型的圈层语言现象。从传播者角度看，使用“集美”强化了主播的个人语言风格，以其鲜明甚至夸张的语音特质吸引关注、塑造人设，进而提升自身影响力与流量。从受众角度而言，早期接触并使用该词的群体，实际上扮演了语言传播的关键节点。随着该词热度攀升与广泛知晓，使用“集美”逐渐成为标识个体属于“熟悉该主播”“认同其表达”“处于信息前沿”等圈层的一种身份符号。

其次，“蚌埠住了”也体现了从圈层标识到大众工具的演变。该词源自安徽蚌埠方言的谐音梗，其核心语义指情感难以自持、处于崩溃或爆发的临界状态。该表达选择放弃原始的规范形式，而选择一个谐音地名，形成幽默反差，能够迅速吸引人们注意力。从传播路径看，该词最初活跃于鬼畜视频等网络亚文化圈层，是圈内用户标识身份的共同符号。随后经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扩散，被更广泛的用户群体接纳使用，但其中不少人并不了解其亚文化起源，仅将其视为一种新鲜、有趣的情绪表达方式。这种错别字的应用既在早期完成了亚文化圈层的身份标识，后期又成为人们情绪表达的幽默工具。

这一语言现象也产生了超出交际层面的社会效应：一方面，它使“蚌埠”这座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网络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地名认知与地方形象传播；另一方面，该梗也使“蚌埠”二字的读音与写法在公众语言认知中得到强化，客观上促进了特定汉字的普及与语言生活材料的丰富。

此外，在粉丝文化中，错别字的应用同样构成鲜明的身份标签。作为网络语言的重要发源地，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内容传播尤为关键。其中，娱乐类内容在当代年轻群体中占据显著地位，各明星艺人的粉丝群体往往拥有特定称谓。本研究以“禾伙人”为例展开分析。“禾

伙人”是农业观察类真人秀团体“十个勤天”的粉丝名称。该团体以承包耕地、鱼塘等方式开展种植养殖，并运用无人机、收割机等技术推动新农业发展。因团体初期农业招商成效有限，且以水稻种植为主，粉丝故以“禾伙人”自称，谐音“合伙人”。这一名称既象征粉丝以陪伴支持团体成长，也体现其对“三农”事业的关注与声援。此类应用错别字的称呼，多源于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投入，也因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成功塑造出“某某粉丝”这一身份标签，强化了群体内部的认同与圈层归属。

最后，在游戏等亚文化圈层中，故意使用形近错别字也成为一种玩梗与社交暗号。“你不乘”起源于一款3D沙盒游戏《迷你世界》的玩家创作的病娇猎奇向视频，视频中主角把“姐姐”关在地下室，每天回家就弯腰凑近铁笼，用低沉的语气问：“姐姐今天乘不乘？”“乘”的反义为“除”，在梗里被赋予了“如果不乖（乘），就会被除掉”的意思。显而易见，“乘”是“乖”的错别字，创作者不乏存有故意使用形近字玩梗的可能性。该用法从游戏圈扩散至全网，成为朋友间调侃的社交暗号，后逐渐蔓延至其他游戏圈层，甚至被应用到弹幕互动与现实交际中，完成传播范围的逐级夸大。

与此相关，近期网络中也出现一系列故意使用错别字的“文盲梗”，如“宝见，我受你一靠子”（原意为“宝贝，我爱你一辈子”），甚至“文盲”本身也被戏称为“文育”。这类表达虽传播范围有限、受众相对特定，却正因如此，成为小范围圈层内部的身份标识，维系着群体之间的默契与认同。

上述例证可以向我们表现出当前环境下，网络语言错别字的使用核心是“错”是手段。而“对”是目的，对的是社会身份的正确识别与确认。语言的“正确性”是流动的，在特定群体内部，被共同认可的“错误”就是“正确”的。而这种错别字的夸大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甚至知晓或使用此类词还可能成为一种“网速快”的文化炫耀。

五、生成动因与功能实现

网络“系统性错别字”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在特定技术环境、经济支持、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章将从多维动因切入，结合语言经济学与模因论，解析其生成与传播的内在逻辑，并最终阐释其所实现的社会功能。

（一）技术动因

网络语言的丰富发展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支持。

1. 平台载体与表达空间

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总是能给社会带来新的变化，产生符合大众新需求的新媒体、新

应用。例如，诞生于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过渡初期的微博，4G 网络全面普及时代的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以及近年来转型成功的“生活方式分享社区”小红书等等。唯物论讲，物质决定意识。这些新媒体的普及和发展，为人们在互联网冲浪、表达意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在不同的平台可以获取不同信息，使用不同方式参与网络生活，创造符合平台传播规律的新作品，其中就包括网络“系统性错别字”，一些错别字的使用经过互联网加工传播后，取得与原意截然不同的新用法，有时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继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追捧使用，完成传播闭环。

2. 平台规约与传播机制

平台不仅是内容的载体，更是通过技术与规则参与社会语言实践的重要部分。任何一个平台的生存与营收，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与内容喜好，因而设置不同的显性与隐性规则，对创作者的语言表达进行系统性管理，直接催生了策略性的语言变异。例如，在符合法律法规与社区公约的情况下，平台会对违禁词以及敏感词进行自动过滤，从而减少该作品内容的投放量。这种情况下则直接倒逼用户进行“避险驱动”类的创新。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米”导代替“钱”的用法，这种错别字的应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隐语、谐音符号的创造性应用，成为错别字生存的一种策略。另外，平台的深层算法中将具有高互动率、高完播率和强情绪张力的内容赋予更高的流量投放，这些包含新奇谐音梗（“蚌埠住了”“栓 q”）、奇怪口音梗（“集美”）或强情感风格（“尊嘟假嘟”“泰酷辣”）的表达，更容易得到用户的浏览、点赞与转发，继而平台又会进行新一轮的流量投放，从而不断扩大该错别字的传播。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模因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苏州（2020）中提到，根据苏珊布莱克摩尔的观点，我们说任何能够通过模仿而得到复制和传播的信息，那么它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模因。基于其在《谜米机器》中所分的模因基因型和模因表现型两个类型，何自然教授在 2007 年进一步提出了模因传播的方式：模因基因型传播和模因表现型传播。而我们网络“系统性错别字”的传播则正属于基因型传播，即模因在传播过程中内容不变，但形式发生了变化。这类模因在传播过程中虽然形式可能不同，但原有内容的精华部分都得以保留。比如针对某一群体的特定推送机制，“十个勤天”粉丝的大量模仿复制“禾伙人”这一称谓，使得其迅速获得认同，让特定错别字快速“习俗化”，成为稳固的身份符号。短视频平台的快速模板化生产与低门槛性模仿的特征，也使得某些错别字模因从原本单纯的文本向“文本—视觉—听觉”过渡，形成模因复合体，其感染力和传播力呈几何倍增长。

最后，互联网是一个整体，各平台间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热梗的存在与兴盛往往要经过几个平台的发酵与传播。例如，“你不乘”首先在游戏圈诞生流行，后来经过抖音的模

板化模仿使用，逐渐夸大到微博讨论以及综艺电视剧节目弹幕互动当中去，最后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微信交流的社交用语。每一次的跨平台传播，都会将错别字带入更大的空间内，叠加传播范围，最终广泛流传于社会对话中。

总之，我们要更加辩证地看待平台的规则与传播机制，模因论的大量复制模仿良莠不齐，真正能够留存下来的网络热梗少之又少，而我们针对错别字的大量泛滥现象却不应该置之不理。

（二）经济动因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日常交际中，人们总是力求其省时又省力。但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看，网络“系统性错别字”的流行，主要遵循的不是单纯的“省力原则”而是“效用最大化”原则。许其潮（1999）认为，“语言作为人力资本之一，能够使人们获得知识和技能，表明语言就是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成为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的资本”^{错误!不能识别的开关参数。}。网络表达的价值不仅在于传递信息，更在于获取情感共鸣与社会资本。一个“错别字”的使用若能带来更高的效益与价值，人们自然会主动地选择它。例如，“蚌埠住了”比“绷不住了”更具幽默感和画面感，其所带来地趣味体验与情绪释放远超过学习这一新形式地微小成本；“泰酷辣”比“太酷了”更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赞美与情绪，更快速度达成认同。所以，人们在互联网只需要支付少量的“认知成本”，甚至不需要知道其缘由，知晓其所代表的流行含义即可，从众使用就可以换取丰厚的“情感与社会回报”。

另外，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裕与思想解放，共同推动了社会心态“趋同”向“求异”的演变。特别是代表新时代生产力的年轻人群体，个体表达欲望空前高涨，相比于传统的面对面口口相传，网络世界的自由空间更能满足其需求，在数字世界中凸显自我存在。这种强烈的个性化诉求，促使创作者主动打破传统语言规范，某种程度上将“错别字”作为一种低成本、高辨识度的风格化工具，以实现快速的情绪传达与身份标识。

（三）文化动因

哲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必会带来文化层面新的变化与繁荣。作为目前网络世界语言创新主体的新时代年轻人，在个体意识的普遍觉醒与社会心态变迁的影响下，更渴望在精神层面获得认同，实现个性，因而他们的需求是网络“系统性错别字”产生和流行的深层文化动因。

在匿名化、圈层化的网络社会中，语言成为关键的认同符号。像主动使用“禾伙人”“你不乘”等群体内部“黑话”，就是一种主动的边界划分，旨在快速识别同类，强化社群归属

感。这解释了为何一些形式上并不高效（如“受你一靠子”）的用法依然小范围流行，其社会价值远超过采用这一形式的学习成本。

通过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将年轻人创作并使用“错别字”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根于情绪。现代环境下，没有了温饱等基本生存压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后生存压力”。这种压力更注重“如何活得更好、更有意义、更被认可”，新的生活与社交压力需要新的窗口释放，所以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语言形式——网络“系统性错别字”。例如，其通过“尊嘟假嘟”进行萌化表演，通过“孝死我了”实施反讽，在以戏谑姿态消解严肃性的同时，也完成了独特的个体或群体风格塑造。还有在“避讪”心理下，“肝脆薯了蒜了”这类谐音变形，为负面情绪提供了安全、委婉的出口。它既完成了情感宣泄，又通过幽默化、具体化的方式消解了直接表达可能带来的心理压力。

（四）社会功能实现

基于上述动因产生的“系统性错别字”，看似是一个语言符号的变化，其实也代表着当代青年参与社会互动、进行文化创造的重要社会实践。笔者认为在其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实现了三重社会功能。

其一，丰富情绪表达与调试功能的实现。创作者改造原有词语，巧妙使用“错别字”，将原词转化为携带特定情绪的符号，如“尊嘟假嘟”“孝死我了”。这些带有丰富情绪的新表达的出现，极大丰富扩充了人们情绪表达的语料库。还有像一些带有极端负面色彩词语的替换，帮助使用者达到既能表现负面情绪，又削弱原词严肃性与沉重色彩。其二，强化身份标识与圈层社交功能的实现。一些网络错别字的使用使得某些群体之间快速识别，成为区分“自己人”的暗号，例如，“集美”最开始通用于主播特定粉丝群体，“蚌埠住了”流行于早期鬼畜文化爱好者等。在社交过程中，此类语言的使用相当于个体身份的明示。其三，拉近社交距离与降低摩擦功能的实现。“系统性错别字”的使用在流传过程中作为共同的“梗”或社交货币出现，能够使交际双方迅速破冰、营造共鸣，快速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减少摩擦。例如，“十个勤天”粉丝群体会通过“禾伙人”称呼进行身份确认，一旦相认后，双方会为共同喜欢一个群体而迅速升温，一方面是对自己眼光、审美的认同与确认，另一方面双方之因娱乐艺人而产生的共同话题多，情感相似，从而减少摩擦。

综上所述，网络“系统性错别字”绝非无序的语言失控，而是青年群体在数字语境下，为满足深层心理与社会需求而进行的主动社会语言实践。然而，正如任何重要的文化现象都伴随复杂效应，网络“系统性错别字”的创造性实践在实现上述积极功能的同时，也必然对既有语言生态、沟通习惯乃至青少年群体价值观产生多方面的冲击，值得引起人们注意。

六、网络错别字的文化影响与反思

网络“系统性错别字”的存在与流行，是数字媒介环境下语言发展的产物，也是语言使用者创造性实践的一种表现。实践证明，它在丰富表达方式、强化情绪输出和构建身份认同等方面展现了语言的活力。然而，这种新的语言现象不可避免地对既有语言规范和语言生态构成挑战，尤其在语言习得、公共沟通等层面引发争议。

无规矩不成方圆。语言规范是保障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有效运转地基石，承载着文化传承、知识传递与民族认同的重要功能。欧阳俊鹏（2004）指出，无论是从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看，还是从我国“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国情出发，为了保证人们交际渠道畅通，必须实行语言规范。规范的书写与表达不仅关乎信息的准确传递，更关系到思维逻辑的严谨性与文化体系的稳定性。尤其在教育领域，规范的汉语教学是培养青少年语言学习与思维以及价值观塑造的核心。

陈红敏、秦梓轩、赵雷（2025）依据扎根理论探讨了网络流行语使用对青少年价值观内容的影响。研究表明，网络流行语使用主要对青少年的自我道德、人际道德和学业道德产生影响。这其中就包括我们本研究的对象网络“系统性错别字”，如“紫砂”即自杀。网络错别字的流行对语言生态与青少年成长影响深远。处于识字写作关键期的低龄儿童和中小学生过早接触信息繁杂的互联网，长期模仿这类非常规表达易形成错误认知，进而出现书写混淆、词汇贫乏的问题，甚至阻碍其构建清晰准确的语言认知体系。这类错误表达与流行、趣味、认同感绑定，易误导低龄群体形成突破规则即创新的片面认知，影响其对规范、严谨与深度的理解和追求。陈洪敏、秦梓轩、赵雷（2005）中提到“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社会化的关键阶段，同辈群体的交往互动是实现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追梗玩梗成为社交暗号的网络环境中，青少年需频繁使用网络流行语获取积极社会认同，这会让未成年人陷入语言焦虑，或过早卷入浅层快消式的表达竞争，从而忽视深度思考与系统性学习。

因此，我们需在支持语言创新发展的同时重视语言规范与语言生态的保护和引导。既要鼓励在适宜语境下创造性使用语言，将其作为观察社会心态与青年文化的窗口，也要明确并非所有简单模仿与胡编乱造都属于语言创新，尤其要加强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规范教育，提升其语言鉴别能力，使其既能体会网络语言的生动性，也能掌握规范表达的严谨性。平台与社会同样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加强监管，共同营造兼具活力与规范意识的健康语言环境。

七、结论与展望

语言与社会相互塑造共同演进。网络系统性错别字的生成与流行既是当代年轻人自主选

择与创新表达的话语实践，也折射出社会文化日趋包容开放的整体态势。互联网语境瞬息万变，网络语言因此具有鲜明时效性，部分曾风靡一时的系统性错别字或许会随新表达形式的持续涌现逐渐淡出日常使用，但我们不能因其存在短暂而忽视背后持续运转的生成机制与深层社会意涵。语言研究既要深化传统理论研究，也要聚焦新兴语言现象，以此推动语言研究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 陈红敏,秦梓轩,赵雷.网络流行语对青少年道德价值观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J/OL].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5[2026-01-02]
- [2] 黄兵.网络词汇变异的社会文化心理透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30(11):110-112.
- [3] 廖红燕.模因论视角下汉语网络流行语的特点[J].语文建设,2012,(16):33-34.
- [4] 刘文良.网络流行语语言变异现象的社会语言学解析[J].汉字文化,2021,(16):16-17.
- [5] 骆正林.网络流行语背后的青年社会心态[J].人民论坛,2022,(10):80-83.
- [6] 罗媛.汉字在数字时代的演变:社交媒体与网络语言中的汉字使用[J].汉字化,2024,(08):102-104.
- [7] 欧阳俊鹏.略论语言规范及其层次性[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83-85.
- [8] 石立春.流行语呈现的青年网络狂欢及潜藏的思想动向研究——基于《咬文嚼字》杂志十大流行语(2009—2018年)的内容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9,(12):54-59.
- [9] 宋培杰.网络语言中的词汇变异现象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04):187-190.
- [10] 苏州.模因论视角下谐音梗传播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2.
- [11] 唐铮,丁振球.认同与宣泄:网络流行语的使用现状与引导建议[J].编辑之友,2022,(02):84-90.
- [12] 田海龙.“语言”与“社会”的互融: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与理论聚焦[J].山东外语教学,2022,43(05):9-20.
- [13] 田鑫.语言经济原则在汉语词汇中的表现[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04):144-147.
- [14] 吴茜.符号·媒介·权力:网络流行语的青年身份认同建构[J].新疆社会科学,2021,(01):133-139.
- [15] 向莉.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网络语言分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3,(10):142-146.
- [16] 肖敏.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网络语言研究[J].语文建设,2012,(04):64-65.
- [17] 徐正迎,朱立华.网络语言的社会语言学分析[J].现代交际,2020,(04):82-83.
- [18] 许其潮.语言经济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9,(04):43-48.
- [19] 占林.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研究[D].广西大学,2020.
- [20] 张晓松.网络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J].语文建设,2012,(08):29-31.
- [21] 赵呈晨,郑欣.语言的游戏:青少年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语境及其行动逻辑[J].新闻界,2017,(05):52-59.
- [22] 郑漪.网络流行语产生的原因及对现代人的影响[J].文学教育(上),2019,(03):140-141.
- [23] 周家得,高晓梅.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网络热词探析[J].经济师,2023,(11):235-236+243.

A Study on Online "Systematic Misspel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Society Integration

Wang Ku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Internet era,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angua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ynamic and cre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society integration" in sociolinguist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of "systematic misspelling" in online language.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it examine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his phenomenon. Drawing upon memetics and language economics, the study delves into the generative and communicative motivations behind such "erroneous forms" in cyberspace, and elucidates why they possess sustained vita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nline "systematic misspelling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main types: efficiency and risk-avoidance driven, emotion and style expressive, and identity-marking. These categories reflect the active linguistic practices of contemporary youth groups in digital contexts, aimed at satisfying deep-seated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needs. However, given the uneven quality of online language and the fact that adolescents' value systems are not yet fully formed, it is imperative for platforms, society, and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to strengthen guidance and regulation regarding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such expressions, thereby fostering a healthy onlin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that balances creativity with normativity.

Keywords: online language; misspelling; sociolinguistics; memetics; language economics

作者简介: 王琨 (2003—), 女, 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